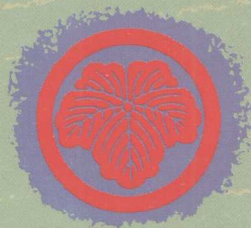


林景淵 著

武士道 與



日本 傳統精神

日本武士道之研究



林景淵 著

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

——日本武士道之研究

人與思想系列 3

武士道與日本傳統精神

——日本武士道之研究

作者：林景淵

發行人：吳樹民

社長：吳豐山

經理：魏淑貞

出版：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02)351-9621 轉 438

郵撥：0003180-1 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四一五八號

法律顧問：蕭雄淋

排版：鴻恩電腦檢排有限公司

印刷：永茂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

第一版一刷：中華民國79年8月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ISBN 957-596-081-5

自序

日本渡過了短暫的「律令時代」以後，由於「莊園制度」的普及而產生了遍佈於全國各地的武士。這些獨特階級創造出與天子、朝廷抗衡的「幕府」，以武力行使統轄日本之事實。從十二世紀到十九世紀，幾達七百年。

武士治國在政治倫理上容有商榷之餘地。但是武士形成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但講求武德之發揚，尤其嚴守忠誠、樸素、有禮等之行爲準則，成爲「三民」（農、工、商）之典範。從中國人的眼光來看，武士那種說一不二、劍及履及的作風尤其令人折服。其「世俗化」結果更形成促進日本現代化之重要因素。

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者極少，研究武士治國及武士精神——即所謂「武士道」——者更是寥寥無幾。筆者自知驚鈍，但基於「今日不做，更待何日？」的單純動機，利用教學之餘，涉獵部份日文有關「武士道」之專著，加以介紹、分析，期國人對日本之「武士道」有一基本認識，以避免始終人云亦云，或捕風捉影，看不到廬山真面目。

往昔楊渡曾言：「孔子之道，不行於中國而行於日本；中國奉其名而日本行其實」。這句話頗有討論餘地。因爲就「武士道」的精神內涵而言，以孔子思想爲中心的儒家學說只是「武士道」的一部份。事實上，它也吸收了佛教（特別是禪宗）和日本既有的神道信仰，這是探討「武士道」時不得不注意的。此外，日本人雖然曾經大量學習中國文化，但日本文化並不等於中國文化，從本書當可獲得具體而清晰之印象。

民初梁啟超曾著「中國之武士道」乙書，意圖鼓舞國人之尚武精神及實踐工夫。該書序文中引用孔子的話語：「我欲見諸空言，不如微之行事之博深切明。」這本小書倘若能引起國人的注意，徹底改掉「空言」的壞習慣，從而學習日本「武士道」之實踐、力行精神，則筆者將欣幸何似？是爲序。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序論

——研究「武士道」的意義

第一節 「武士制度」的起源·····	1
--------------------	---

第二節 「武士道」的定義與來源·····	2
----------------------	---

第三節 中國的「士」與日本的「武士」·····	6
-------------------------	---

第四節 研究「武士道」的時代意義·····	9
-----------------------	---

第二章 「武士治國」的背景

第一節 「攝關政治」與武士·····	17
--------------------	----

第二節 「莊園制度」與武士·····	23
--------------------	----

第三節 「源平之戰」與武士之崛起·····	29
-----------------------	----

第三章 武士政權的建立與演變

第一節 鎌倉幕府·····	39
---------------	----

第二節 室町幕府·····	42
---------------	----

第三節	戰國大名時代	45
第四節	織、豐政權	49
第五節	德川幕府	52
第四章	幕府時代之權力結構	
第一節	武士治國時代的日本政情	57
第二節	鎌倉、室町幕府的權力結構	61
第三節	德川幕府之權力結構	65
第五章	武士的教育、職務與生活	
第一節	武士的教育	73
第二節	武士的職責	84
第三節	武士的生活	95
第六章	武士的特殊行爲	
第一節	復仇	103
第二節	切腹	111
第三節	隱居	118

第七章 武士的德目

1. 忠誠	124
2. 武勇	127
3. 名譽	130
4. 禮儀	134
5. 廉潔	141
6. 樸素	144
7. 勤學	146

第八章 元祿忠臣藏

——日本武士復仇之一章

第一節 「忠臣藏」與日本人	151
第二節 赤穂浪士復仇事件	152
第三節 「赤穂浪士復仇事件」之討論	165

第九章 結語

第一節 武士道之評析	173
第二節 武士道的時代意義	188

第三節 武士道與儒家文化

194

附錄一 幕府政權之各種法規

1. 貞永式目

..... 207

2. 武家諸法度

..... 210

3. 旗本諸法度

..... 213

4. 代官需知

..... 215

5. 天和改革十九條

..... 216

附錄二 武教小學

..... 219

第一章 序 論

—研究「武士道」的意義

第一節 「武士制度」的起源

日本從鎌倉時代（十二世紀）起，經過南北朝（室町時代）、江戸時代，以迄明治維新（西元一八六七年）為止，在大約七百年之間，出現了世界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政治局面。

在這漫長的數百年間，原有的統治者——天皇——喪失了政治實權，他不僅無法對天下百姓發號施令，甚至連皇宮內的皇族以及圍繞在宮廷附近的公卿（稱為「公家」，以和武士的「武家」區別）往往也由背後的另一股力量（即「院政」，下文將有詳細詮釋）掌握；天皇成為不折不扣的偶像而已；真正的統治者乃是「幕府」的「將軍」。

然而「幕府」本身也並非沒有問題存在。首先是繼承的實質問題，往往演變成爲激烈的政治鬥爭或軍事鬥爭，鎌倉幕府的源氏之沒落和北條氏的竄起便是一個具體的例證。另外一個嚴重問題是在「幕府」之下又出現了一層層的統治體，特別是江戸時代，這些統治體（「大名」、「旗本」等）的一部份，其勢力幾乎可以和「幕府」平行。如此一來，「幕府」的治權之發揮也大打折扣。不過，大體上看來，在這七百年間實際統治日本的乃是「幕府」。

，這一點不容置疑。

從上述的「鎌倉幕府」以至「德川幕府」，支撐政治、軍事的力量乃是「武士」。不過，「武士」有指揮三、五人之低階武士，而握有全國統治權的「將軍」也是「武士」。因此，吾人可以瞭解，「武士」乃是日本十二、十九世紀之間的統治者階級，他們位居農、工、商之上，而成為「三民之長」。（注一）

第二節 「武士道」的定義與來源

簡單扼要的說，「武士道」乃是「武士」的「道德及行為準則」。

戴傳賢在「武士生活與武士道」一文中（注二）明白的界定了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和行為和行為準則：

精神方面：輕生死、重然諾、尚意氣。

行為方面：擊劍、讀書、交友。

洪炎秋在「日本的武士道」一文中（注三）提到：「日本的武士道，就是在這種（指日本中世紀）以戰爭為職業的武士的社會裡面，發達出來的特殊的實踐道德。」又說：「武士道是武士特別需要遵守的行為規範。換句話說：武士道就是陪伴著武士的身份而來的義務。它是武士間所通行的風俗習慣；經過了長年月的洗鍊，自然而然地醞釀成功的，存在於世上的一種客觀的不文律。」

日本歷史學家奈良本辰也氏在「武士道之系譜」(注四)乙書中指出：從某一個角度來看，日本的「武士」和歐洲中世紀的「騎士」(Knight)應該是有相通之處：兩者共同偏離現實，極力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在騎士、武士的世界裡，更充滿了美、狂、醜惡以及敘說不盡的人間哀歡。

在「武士道」的研究方面留下一本經典鉅著「武士道」(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注五)的新渡戶稻造博士所下的定義是：「武士道乃是武士在公務以及私生活中必須遵守的準則。」「它是伴隨武士階級而存在的義務。」新渡戶博士特別強調「武士道」這個名詞很難以其他文字本確切的表達出來。他舉了一個實際的例子：英文的Gentleman和法文的Gentilhomme這兩個名詞乍看之下十分接近，但深入探討則不難發現兩者存在著微妙的歧異。正因為如此，新渡戶博士直接把「武士道」音譯成「Bushido」，不以其其他方式表達。

至於「武士道」的來源，新渡戶博士的分析認為，「武士道」本自多方面的文化根源：①佛教教義——平常心，服從、沉著、輕生慎死等均來自佛教。②神道——忠君、敬祖、孝順，使武士在傲慢的背後兼具服從美德。③孔孟學說——孔子在五倫的遵守以及處世智慧上賦予「武士道」正確的中心思想；而孟子的平民思想和豐富的人情觀也充實了「武士道」的內涵。(注六)

另一方面，吾人不得不注意的是：「武士道」在七百餘年間，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

「武士道」的涵義也曾有若干變動。例如，十七世紀日本漢學家山崎闇齋（西元一六一八—一六八二年）是研究朱子學的學者，卓然成一家之言。（注七）但是他的弟子淺見綱齋卻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淺見綱齋所著「清獻遺言」中，收錄了屈原、孔明、陶淵明、顏真卿、文天祥、謝枋得、劉因、方孝孺等八人的文章，以供武士們研讀。八人的共同特色是忠臣、烈士楷模，而且都是實踐派，不是空談理論的學者。（注八）

上文引用的「日本論」（戴季陶著）在探討「武士道」方面批判多於分析，這固然是此書完成於中、日敵對的狀態下（民國十七年），作者運筆時難免流於情緒化，但戴氏對「武士道」恐怕也沒有下功夫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因此，在談論「武士道」時他只能輕描淡寫的說：「戰爭的事越多，武士的權力越是強大。」（日本論、六）「武士為藩主或藩主的家系而奮鬥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質上的社會關係結合成的，並且淵源於歷史的因襲，含有不少的神秘氣氛。」「在封建時代，這一種為保存家系而努力的事實和奮鬥的精神，是他們社會所最讚美的。以為這是道德的極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夠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體，與佛同化，與宇宙長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會越是讚美。」（日本論，七）

戴氏的推論也許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道理，可是他把「武士道」的來源含糊的說是「歷史的因襲」，再冠上「神秘氣氛」，並繼續發展成為「越是神秘……社會越是讚美」的結論，基本上已偏離了本題。

倒是余又孫氏在所著「宋元中日關係史」乙書中（注九）對於「武士道」的精神淵源有比較確切的說明，他說：「武士道之教義為忠孝、武勇、慈悲、禮讓、勤儉樸質，重名分、尚節操、一生死。除得之於日本之神道與中國傳入之儒教外，佛教之禪宗教義實為武士道精神之重要要素。」

二次大戰以前，日本由軍方控制政局，為了鞏固軍事政權，他們命令「文部省」編了一套「日本精神叢書」，把日本吹噓成為全世界唯一大國。在這一套「精神叢書」中，有一本「太平記與武士道」（高木武著），其中對於「武士道」的淵源竟如此這般的敘述著：

「武士道根源於日本國民之固有品德與性情，並以發揚武德為指標，故遠自開國之初即有武士道思想。」

開國之初，伊弉諾尊、伊弉冉尊接受天神詔命以開天闢地，其時所用者為天神所賜之『天瓊矛』。天照大神命天孫瓊瓊杵尊降臨我國（指日本）時，親授神鏡、神璽、神劍以為皇位之表徵。天瓊矛及神劍乃是我國崇尚武德之象徵；其真正意義並非破壞性的，而是建設性的；也涵蓋著一統全國之義。此外也暗示神器蘊藏著尊貴而不朽之生命。

武甕槌神、經津主神曾攜帶靈劍以平定葦原之國，以迎天孫之降臨。此間，充分發揚武德，以鞏日本之武道也。」

這種可以媲美古代希臘神話的故事，當然百分之百是捏造的；可是在二次大戰以前卻成為政府、軍人推銷國家主義，帝國主義的工具；連擁有文學博士的高木武也不得不在客觀情

勢下撒了漫天謊言，硬說「武士道」是「天神」開國時即擁有完整的精神體系！

第三節 中國的「士」與日本的「武士」

中國歷史上的「士」和日本的「武士」有無共同淵源，其異同又如何呢？

根據顧頡剛的說法，他認為古代有「武士」，這些「武士」後來轉化為「文士」：

「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為低級之貴族，居於國中（即都城），有統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注十）

研究「士」極有心得的劉澤華氏雖然對顧頡剛的說法持懷疑的態度，可是他也肯定的指出：

「春秋以前，士作為一個等級，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士之子恆為士』（國語、齊語）到了戰國，士雖然仍有等級的含義，但逐漸轉變為社會上的一個階層。這個階層成為上（統治者、官吏和剝削者）與下（被統治者、民、被剝削者）交流、轉換的中間地帶。」（注十一）

龔鵬程氏贊成春秋戰國時代存在「武士」之說法，也肯定當時武士行為之價值：

「春秋戰國之士，如名譽為他人侵損，則必報仇，以恢復武士之名譽；對尊長，則忠實服從，然若其舉動有損於國族大計或名譽者，必抗責不假借；有罪不逃刑；忠於職掌，不惜犧牲；受人之恩，則以死報之，朋友有難，又常犧牲性命財產以救之。橫絕四海，

結風雷以為魂，壁立萬仞，鬱河嶽而生色。」（注十二）

龔氏的結論是：春秋戰國之士，「並不遜於日本的武士道。」

可是，前引劉澤華氏的另一篇著作「先秦時期的士」的說法又稍有不同，他說：

「從西周到戰國，士有多層含義，不可以偏概全。如有的說，春秋以前的士即武士，或把士視為知識分子，還有的認為士與民基本相同等，均不確。」（注十三）

根據劉氏的研究結果，在先秦文獻中，有關「士」大約有以下六種含義：

①男子通稱。

②等級系列中的一個特定等級。

③軍士。

④文士。

⑤西周春秋卿大夫亦稱士。

⑥獄吏與低級官吏。

顧頡剛氏又曾分析，在戰國以後，「武士」變成了「文士」：

「講內心之修養者不能以其修養解決生計，故大部分人皆趨重于知識、能力之獲得，蓋戰國時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國君、相，知識既豐，更加以無礙之辯才，則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寧越不務農，蘇秦不務工、商，而惟以讀書為專業，揣摩為手腕，取尊榮為目標，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與昔人同；其事在口舌，與昔人異，于

是『武士』乃蛻化而為『文士』。」（注十四）

劉澤華氏也持相同之看法，他說：「從春秋中後期到戰國，士的社會角色逐漸由主要為武士轉為主要為文士」。而且其時「有關文士稱謂不下三、四十種」，他又把「文士」分為三類：（注十五）

- ① 以從事理論思維和追求道德理想為人生追求——如：通士、志士、修士、正士……等。
- ② 智能之士——如：法術之士、有方之士、游說之士，策士……等。
- ③ 技能之士。

關於「士」大抵是「文士」這一點，余英時氏的見解亦相同，他在「士與中國文化」（注十六）乙書中有極為詳盡之探討。

「論語」中所提到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孟子」中所提到的「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乃至宋儒范仲淹所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中的「士」應該是指「文士」而言，這大約是沒有問題的。即兩漢時所謂「養士」、「選士」亦指「文士」，而非「武士」。（注十七）後世又有所謂「儒士」，這也是「文士」。（注十八）

綜合以上引用各家說法及有關史料，吾人大約可以歸納成幾項重點：

（一）秦漢以來，中國的「士」是「文士」，是知識階級；日本的「武士」則為道道地地的軍人。

(二)嚴格說來，中國秦漢以後的「士」在身份上並沒有明確範圍；日本武士之身份、地位、職務，責任，甚至日常行為，一一都有規定。（不過春秋戰國時代則有武士）

(三)中國的「士」要做到「仁以為己任」，或以「天下」為己任；日本武士則一心效忠主君。兩者截然不同。

(四)在周朝之「莊園制度」下，各地「采地」、「國」（指城邦）發生了武士。日本武士幾乎也是在相同狀況下孕育出來的。

(五)周代之「武士」已具有日本武士之雛形，其一是階級（而且繼承制），其二是當時貴族家中有職事官及家臣。

劉澤華氏在「先秦時期的士」中即提及「士之嫡長子繼承為士」；他也引「周禮」中「士在王宮充任宮正、膳夫、庖人、醫師、獸醫、酒正、司書、司裘等各種職事官」，而孔子早年也曾季氏家做過「委吏」、「乘田」。

不過，本書比較著重在前三項，亦即我國「文士」與「武士」之探討，這是應該加以聲明在先的。

第四節 研究「武士道」的時代意義

「武士道」精神源自於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者既深且廣，這在上文中以約略加以介紹過。美國學者哈約翰（John Whitney Hall）甚至認為：「儒者的主要成就之一，就